

· 民族语言文献研究 ·

《论语全解》的版本与校勘刍议^{*}

——以西夏文本为中心的考察

郑 昊

内容摘要:现存《论语全解》中,西夏官方刊行的西夏文本年代最早,且翻译质量精良;它是现存最早的非汉文刻本儒学典籍,亦是宋元时期各族群以儒学典籍为媒介展开文化交流的实证。以西夏文本为标尺,可判定各汉文本《论语全解》的质量: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和清乌丝栏精抄本的质量足可作整理底本,而四库本质量实在不佳。以对勘结果为基础,还能进一步细化文献的版本划分,判明各版本的近似程度。在校勘价值方面,可从西夏文本中识别出 8 例价值较高的异文,为揭示汉文本中较早产生的问题提供了证据,能一定程度还文献以原始面貌。

关键词:陈祥道 《论语全解》 西夏文 《儒藏》

陈祥道是北宋荆公新学的重要人物,其所撰《论语全解》是新学一派唯一完整留存于世的《论语》类著作,为历代学者所重。针对《论语全解》的历史学、文献学、经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①。其中贡献最大者,首推 2008 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于《儒藏(精华编一〇五)》中所刊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第 75 批面上资助项目“西夏译荆公新学著作研究”(2024M7536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祥道撰,刘蔷、姜海军点校:《论语全解》,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编:《儒藏(精华编一〇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苗露、金生扬:《陈祥道〈论语全解〉的解经特色》,《船山学刊》2012 年第 2 期,第 61—65 页。刘维:《从〈论语全解〉引子证经看北宋经学“子学化”倾向》,《兰台世界》2015 年第 12 期,第 9—10 页。胡鹏:《陈祥道〈论语全解〉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肖永明指导),2016 年。

行的《论语全解》点校本,该版本亦于近日单独刊行^①。该本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参校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与四库底本(即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于点校、对勘方面着力甚深。其校点说明简要梳理了《论语全解》的版本系统,大致介绍了其所掌握六种版本的情况,但未提及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本^②。2016年,胡鹏在其学位论文中讨论了《论语全解》的版本及其流传,补充了《儒藏》校点说明中未言及的两种版本,即明小草斋抄本与西夏文本的情况,但未涉及西夏文本与汉文本的对勘问题^③。此后,专门针对《论语全解》展开的文献学研究几乎绝迹。

前文已述,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留存有西夏文本《论语全解》,然而针对该文本的研究目前仅止步于文本翻译之类的初步研究,尚未有学者对西夏文本与各类汉文本展开细致的对勘。笔者在重新翻译《论语全解》时发现,西夏文本不仅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而且能够切实解决传世汉文本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下文尝试将西夏文献视作中国传统历史文献的一个分支,通过把西夏文《论语全解》引入传世汉文本的研究中,并以该文本为中心,重新探讨《论语全解》的版本与校勘问题,以期充分认识西夏文本的价值。

一、《论语全解》西夏译文的翻译特点与历史价值

西夏文《论语全解》刻本残本,1909年由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率领的“俄国皇家蒙古四川地理考察队”发现于黑水城遗址,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为 инв. №147、148、149、784、7215。麻纸刻本蝴蝶装,今存26叶。左右双栏,版框18×12.7cm,每半叶8行,每行最多18字。该书经文顶格印制,注释则低一格,版口最上方横印西夏文“𐽀𐽁𐽂”(《论语》)。此外,版口还按顺序从上到下印有汉字卷数、西夏文刻工名与汉字叶数。现存卷三、六、八、十,皆首尾不全。所涉内容有《公冶长第五》《先进第十一》《卫灵公第十五》《子张第十九》《尧曰第二十》,其中残缺最多的是《公冶长第五》。

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陈祥道撰,刘蔷、姜海军点校:《论语全解》,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以下凡引《论语全解》若无特殊说明,皆指此单行本。

②《论语全解》校点说明,第1—5页。

③胡鹏:《陈祥道〈论语全解〉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肖永明指导),2016年,第8—9页。

在上世纪,克恰诺夫、科罗科洛夫、吴其昱、陈炳应等学者都研究过该文献^①,其中吴其昱首次判定该文献为《论语全解》,但其观点未被广泛知晓。1992年聂鸿音再次明确了俄藏该《论语》文献即为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并做了全文翻译及与四库本对勘^②。由此,这份文献的真面目才为国内学术界所熟知。1999年,《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刊布了该文献的清晰照片^③。此后再未见到直接涉及该文献的专题研究,亦未有学者将西夏文本引入汉文本系统进行研究。

关于西夏文本《论语全解》翻译与刊刻的历史过程,由于史料缺失,尚不能详知,但大致脉络已由聂鸿音等前辈学者进行梳理^④。即西夏仁宗时期,在学习中原儒学时,西夏官方选定了同属荆公新学的陈祥道《论语全解》与陈禾《孟子传》、吕惠卿《孝经传》作为学校教材,这是西夏彼时推行文教的一大特点。尽管在西夏文《论语全解》中没有序跋与题款,但在版口中发现了8个较明确的刻工姓名^⑤,共在文献中出现了19次,分别为:“𐽮 kjwi¹ 𐽮 xjow¹”(桂向)出现1次,“𐽮 sji¹ 𐽮 thji¹”(西田)出现1次,“𐽮 sja² 𐽮 po¹”(善宝)出现3次,“𐽮 sja² 𐽮 rjar¹”(善啰)出现2次,“𐽮 xjwi¹ 𐽮 te¹”(惠灯)出现3次,“𐽮 tshja² 𐽮 kew²”(千狗)出现5次,“𐽮 wji² 𐽮 tsjiw¹”(鄞周)出现3次,“𐽮 te¹ 𐽮 zji¹”(德儿)出现1次。这些刻工的姓名与西夏乾祐十二年(1181)六月西夏刻字司刊版《类林》中的刻工部分重合,同时与乾祐十三年五月刻字司重刻版《圣立义海》中的刻工

①3.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В. С. Колоколов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Лунь Юй, Мэн Цзы, Сяо Цзин),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6, pp. 3-49. Wu Chi-yu, “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 *T’oung Pao*, vol. 55, 1969, pp. 298-315. 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2—380页。

②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21页。

③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59页。

④聂鸿音:《中原“儒学”在西夏》,《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第20—25页。聂鸿音:《再论西夏“蕃礼汉礼之争”》,《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87—94页。

⑤刻工姓名汉译详参孙伯君:《西夏版刻文献中的刻工、书者和功德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第129—134页。

姓名有重合,这意味着西夏文本《论语全解》的刊刻是由西夏官方主导的刻字司完成的。由于西夏刻字司的独立刻书时间主要集中在西夏仁宗乾祐年间(1170—1194),因此西夏文《论语全解》翻译、刊刻完成的时间最迟不晚于1194年。而在刊刻完成后,西夏文《论语全解》应当在官方力量推动下,在一定范围内传播。英国国家图书馆即藏有编号为 Or. 12380—385 的西夏文《论语全解》残片,属卷七《子路第十三》的“冉子退朝”章。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西夏文本会避讳夏仁宗李仁孝的“孝”字,具体做法是将西夏文“𐵇”(孝)字右下角的一竖缺笔。但这一规定执行的并不严格,在残卷中出现6次“𐵇”(孝),避讳5次,未避讳1次,对于“仁”字则根本未避讳。在西夏文译文方面,这份文献在翻译时有三方面的显著特点:

第一,西夏译者尽量贴近汉文原文翻译,译者为迁就汉语语法,极少使用动词趋向前缀。如西夏文献中常用的表示向远处趋向的动词前缀“𐵇 wji²”与向近处趋向的动词前缀“𐵇 kji¹”在西夏文《论语全解》中未见使用。这种译法违背了西夏人的基本语法,但减少了翻译时要增添的虚词数量,尽量做到了字数上与汉文原文一致。

第二,在翻译专有名词时,西夏人采用了意译与音译结合的方式。采用意译的词语多是中原地区最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包括圣人名、书名等,如孔子意译作“𐵇 𐵇 𐵇”(夫子)、《坤》卦意译作“𐵇”(地)、《论语》意译作“𐵇 𐵇”(《论语》)。除以上几种外,普通专有名词基本采用了音译的方式,例如“𐵇 sjwi¹”(舜)、“𐵇 lji² 𐵇 tsə¹”(列子)、“𐵇 jī¹”(殷)、“𐵇 we² 𐵇 · u² 𐵇 kow¹”(卫武公)。

第三,在具体文意方面,西夏人在不违背原文大意的基础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首先是在翻译时灵活使用西夏字,努力避免歧义,如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章中有“君之南乡,答阳之义也”,为避免歧义,西夏文本将“君”译为表帝王之“𐵇”。其次是针对一些西夏人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文中会在把握概念核心的基础上使用解释性翻译。如卷六《先进第十一》“子曰先进”章中以“𐵇 𐵇”(执中)意译“中庸”,精准表达了“中庸”一词的内涵。最后是针对西夏人不常见的事物,译者会用西夏人熟悉的事物代替。如卷六《先进第十一》“南容三复白圭”章中有“服则元衣而纁裳”,以西夏文“𐵇 𐵇”(上玄)译“元衣”,以“𐵇 𐵇”(下红)译“纁裳”,这样的翻译既保证了行文的简洁,又方便西夏人理解。不过尽管其译文有时会作变通,但在有可靠汉文本对勘的情况下,该西夏文

体上可反映其所据宋代汉文底本的样貌。

通过对勘解读,还能以这份西夏官方刊行的《论语全解》为窗口,观察彼时西夏人的思想。如《卫灵公第十五》“子张问行”章中有“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其中“蛮貊”指的是远离教化的夷人部族,而西夏文则在此处以“𐵇 kjij¹ 𐵇 xu¹”二字意译。“𐵇 kjij¹”字既表示“蛮夷”,又表示“汉人”“汉所居地”;“𐵇 xu¹”字既是“吴”或“吾”的译音字,又表示“回鹘所居地”。可见,西夏人认为自身才是文教中心,周边的回鹘、汉等才是“蛮貊”。这种从文教层面彰显自身优越性的做法,亦与彼时中原士大夫面对不能实现大一统的现状,而致力于“正统论”“华夷之辨”的心态不谋而合,可以说二者处于同一种历史语境之中。

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亦非“汉化”这种说法可以解释。当此之时,中原地区勃兴的儒学复兴运动改变了儒学的存在状态,宋儒兴起的宋学用更开放的关怀与更发散的思维将儒学的核心从“经”“术”转变为“道”“理”,以往由汉儒“经典化”的儒家经文经宋儒阐释走入“变古时代”^①。儒学由此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千人千义”成为彼时的治学常态。同时,契丹、党项、女真等族群的整合与崛起,使得更多族群的文明程度迈上新的台阶。他们需要吸收成熟的文化资源供他们在治国理政、兴盛文教方面尽快有所作为,一个开放的儒学世界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因此从更广阔的历史层面观察,西夏政权主动刊刻西夏文《论语全解》一事在中华民族与周边族群的交往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以该文献为代表的一批西夏文儒学典籍的出现意味着,尽管宋元时期中华民族历史进入多语言、多文种共存时代,但各个族群并没有以血缘、语言文字为畛域划分族群界限,而是互相学习、共享共融。尽管也会存在斗争与矛盾,但从文化上来看总体的发展方向仍然是向内聚拢。

仅从西夏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来看,西夏并没有因为长期与宋对立而隔绝文化交流。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就影响到西夏士人,不仅能够西夏文献中发现司马光、苏轼等鸿儒著述的痕迹,西夏本土编著的《德行集》中也透露出宋儒普遍持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内圣外王”的观点^②。而荆公新学的崛起则更受西夏人的关注,除了新学代表人

^①皮锡瑞:《经学历史》,朝华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②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西夏研究丛书》第三辑,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物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在西夏文文献中还有王安石变法时的副手吕惠卿所著《孝经传》，以及成名于徽宗时期的士大夫陈禾所著《孟子传》。《孝经传》《孟子传》已无汉文本存世，西夏文本的存在正可补典籍亡佚之憾。而《论语全解》虽有汉文本存世，但最早不过是明代抄本。西夏文《论语全解》作为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用非汉字书写的、由非中原政权官方根据宋代相应版本翻译、刻印、颁行的儒学类著作，实可为校勘存世汉文明清版本相应内容提供可靠依据。

二、夏—汉文本对勘与西夏文《论语全解》版本价值再认识

前文已述，目前对该文献的研究基本都以文渊阁四库本为底本展开，如《儒藏》在编修时即以四库本为底本。尽管点校者参校了非四库系统的本子，且发现了四库馆臣在校订时多有舛误。但由于缺乏足够可靠的版本参校，点校者对四库本与非四库版本间存在的多数差异都只出校语而未进行校勘。这种“存而不论”的做法当然是条件所限的无奈之举，但引入西夏文本《论语全解》为依据，就能够一定程度上打破这种局面。在此基础上，还能利用对勘结果展开对汉文本版本系统的精细划分，一定程度上更新学界对现存版本的认知。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简要梳理汉文本《论语全解》的大致情况。

作为荆公新学类著作，《论语全解》在北宋时期曾有过广泛流行。据《郡斋读书志》记载：“右皇朝王安石介甫撰（《论语解》），并其子雱《口义》，其徒陈用之《解》，绍圣后皆行于场屋。”^①至南宋时，除高宗朝时期外，朝野对荆公新学的批判甚多。及至理宗朝理学定于一时，此书当不再大规模流行。陈祥道，《宋史》无传，《论语全解》在《宋史·艺文志》中亦无著录。目前能见到最早著录该书的是《郡斋读书志》，录为“陈用之《论语》十卷”^②。次为明代杨士奇在《文渊阁书目》中，著录“《论语陈用之解》一部五册”^③。此后明清两代多个书目曾著录该书，自明代朱睦㮮起，其题

①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②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136页。

③杨士奇等编：《文渊阁书目（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4页。

名多著录为《论语全解》或《重广陈用之真本人经论语全解义》^①。

(1) 非四库本系统汉文本四种: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索书号:761751-54,以下简称“上图明抄本”)、台北汉学研究中心藏明谢氏小草斋抄本(索书号:108.32 00747,以下简称“明小草斋本”)、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原北平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索书号:平图 000539-000543,以下简称“明蓝格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乌丝栏精抄本(索书号:故善 002615-002619,以下简称“清乌丝栏本”)。

其中非四库本系统汉文本中的明蓝格本、清乌丝栏本少为学界注意。为提高对勘文本的丰富性,笔者选用四库本与非四库本系统的抄本分别与西夏文本对勘。对勘的章节以西夏文本留存的内容为主,即卷三、六、八、十的内容。通过对勘,首先可以发现汉文本中四库本与非四库本存在较大差异,兹举以下例证展开说明(见表1)。

篇章	四库本系统	西夏文本	非四库本系统
卷三《公冶长第五》季文子三思	于率尔而对则责之。	𐽳𐽱𐽲𐽴𐽶𐽸𐽺𐽼𐽾𐽿④	于率尔而对则责之以不逊。
卷三《公冶长第五》季文子三思	备豫不虞。	𐽰𐽲𐽴𐽶𐽸𐽺𐽼𐽾𐽿	备豫不虞，古之善教。

①历代著录的情况,学者已有详细统计,详参顾宏义、戴扬本等编:《历代四书序跋题记资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52—254页;胡鹏:《陈祥道〈论语全解〉研究》,第10—11页。

续表

[illegible]

以上所举 9 例中,非四库本系统的各汉文抄本内容一致而与四库本相异。通过引入年代最早的西夏文本为据,可坐实四库本系统在这 9 处确实都有脱讹衍倒的问题。其中脱文 4 处:第 1 例脱“以不逊”;第 2 例脱“古之善教”;第 4 例脱“《中庸》所谓时中者此也”;第 7 例脱首个“士”及“盖”;皆脱文两字以上。讹文 2 处:第 3 例讹首个“诗”为“什”,讹第二个“诗”为“章”;第 5 例讹“执”为“葬”。衍文 1 处:第 6 例衍“之意”。倒文两处:第 8 例倒“终身之忧”与“有远虑”;第 9 例倒“道”与“教”。通常来说,抄本文献在传抄过程中由于不同原因会产生各种错误,这是无法避免的“自然现象”,属于能够理解的范围。而从以上内容来看,在拥有多种明抄本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四库本《论语全解》尽管修订了前代抄本中的一些讹误,却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尤其是多种非四库系统抄本都保持一致的内容,在四库本中却无故出现了脱讹衍倒,反映该版本内容之粗糙。由此,四库本的质量应该是低于非四库本系统的汉文本,不适宜作

为整理校勘的底本,属四库本系统的几种抄本亦如是。

表2 四库本、西夏文本、三种明抄本与清乌丝栏本对勘举隅

以西夏文本为基准,以上所举4例中,三种明抄本在第1例皆讹“甚”为“其”,第2例皆脱“悔”字,第3例皆讹“董”为“僮”,第4例皆讹“丘”为“立”。三种明抄本与四库本、清乌丝栏本亦有明显区别。四库本的情况前文已叙,清乌丝栏本的情况则与四库本不同,该抄本不仅在讹误方面较三种明抄本更少,还较少出现脱文。通过与西夏文本对照,可发现除在卷十《子张第十九》“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章中脱“方武叔之不可仲尼”外,再未有清乌丝栏本独自出现脱文、倒文的内容。而该抄本的其余问题

大部分皆属鲁鱼亥豕之类,如讹“及”为“以”,讹“辨”为“辩”,讹“扬”为“杨”等,既与三种明抄本的问题有所区别,又不似四库本大量脱讹衍倒,因此版本整体质量是相对可靠的,缺点是别字较多。

继续深入比勘,可发现三种明抄本中还可继续划分层次,其中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间的关系较近。如第六卷《先进第十一》“季氏富于周公”章中,西夏文本有“《易》蕢𦵏𦵏席𦵏蕢𦵏”(《易》夬扬于王庭),汉文本中只有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皆讹“夬”为“史”;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子曰人无远虑”章中,西夏文本有“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则有远虑,必无近忧矣),只有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脱“必”字;卷八《卫灵公第十五》“子曰人无远虑”章中,西夏文本有“𦵏𦵏𦵏𦵏”(君子之于仁),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皆讹“君子”为“居子”。更有说服力的是卷十《尧曰第二十》“尧曰咨尔舜”章中,西夏文本作“𦵏𦵏𦵏𦵏𦵏𦵏𦵏”(非历无以纪数),两种明抄本皆于“纪”字有讹,明蓝格本讹为“緝”,明小草斋本讹为“紺”。而从字形上来看,“紺”似讹自“緝”,这显示出二者相对紧密的关系。除两种明抄本共同的讹误之外,这两种抄本各自又有鲁鱼亥豕的问题。因此这两种抄本存在的脱讹衍倒,是由非四库诸本、三种明抄本、两种明抄本共同存在的问题,及这两种本子各自存在的问题叠加而来,其质量可见一斑,当仅略好于四库本。而上图明抄本则不存在以上两种明抄本的问题,在比勘中亦未见到单独出现脱讹衍倒的情况,因此上图明抄本的质量大体与清乌丝栏本相当,或稍高于后者。

通过引入西夏文本展开对勘,已经明确了各版本的相近程度与版本质量。就版本相近程度来说,四库本与非四库本间存在较大差异;而在非四库本的四种本子中,三种明抄本之间的关系比清乌丝栏本更近,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之间的关系又比上图明抄本更近。而就版本质量来说,第一等是可引为底本的版本:上图明抄本、清乌丝栏本;第二等是质量不佳仅可供参校的版本:明蓝格本、明小草斋本;第三等则是质量最低的四库本及与其有源流关系的各版本,不宜作为文献整理的底本。

三、西夏文《论语全解》的异文及其校勘价值

除了版本学价值外,通过对勘发现的西夏文本异文亦具有校勘传世文本、补充散佚文本的价值。聂鸿音在解读西夏文《论语全解》时以四库本为汉文底本识读出了大量异文,然而通过引入更多汉文本展开对勘后,

可发现这些异文的产生多是由于四库本质量不佳。通过展开多种类文本的校勘,可识别出一批西夏文异文,能够补传世汉文本之阙。兹将其中有价值的 8 例列举如下:

(1) 卷六《先进第十一》“子曰从我于陈蔡”章中,西夏文本作:

憊毆烟烟救喉喉，緝惜散散？嫩精効蕤效嫩嫩，祇效祇祇，
効効蕤祇該効効雙嫩娘。《蕤》蕤：“嫩蕤嫩雙嫩。”散散。憊雙娘，
緝終嫩娘効娘効。嫩娘効娘，効嫩娘効娘。

王莽以四科取人,不亦伪哉?颜子学于孔子,尽得其言,故闻孔子言时无不悦。《记》曰:“相悦以解。”是也。无不悦,则更亦无疑问也。无可生吾意,故非助我也。

首先,西夏文本中“𐽳𐽭𐽮𐽱”(不亦伪哉)之后的内容为诸本所无,主要是陈祥道对经文中“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的阐发,可确定是诸汉文本之脱文。其次,传世诸汉文本的差异在于,四库本与清乌丝栏本“四科取人”作“四科取士”,三种明抄本则为“取人”。但考之西夏文本,以表“人”的“𐽳 dzjwo²”译“取”后一字,确证“四科取人”的可信。此处西夏文本不仅补充了传世汉文本的脱文,还解决了原文为“人”或“士”的疑问。

(2) 卷八《卫灵公第十五》“明日遂行”章中,西夏文本作:

[illegible]

于此时言由知德者鲜，愠见甚于色作矣。

三种明抄本都将“甚于”抄作“其于”，由于“其”字的存在，后半句于理不通，因此清乌丝栏本将后半句改写为“愠见于色作之时矣”。四库本删去“其”，改写后半句为“愠见与色作矣”。考之西夏文本，以表“甚”或“胜”的“𐽳 dzjij¹”译“愠见”后一字，可见此处当为“愠见甚于色作矣”。三种明抄本讹“甚”为“其”，四库本与清乌丝栏本则有脱文、衍文。总之，对照西夏文本勘同，可帮助辨别汉文本部分不易察觉的字形讹误。

(3) 卷八《卫灵公第十五》“明日遂行章”中,西夏文本作:

姑疑常辨、藏辨效能可拔辨效，常辨效效此能，能能效效。
 能可拔辨效能，能而多能能。藏常辨能能多形形，能能可拔辨效能，
 能而能能能。

孔子于子贡、曾子皆言以一贯之。子贡不知德，则多学而已。曰“予一以贯之”者，所以语之也。曾子之孝可以语道，曰“予一以贯

戒后世的圣人言,不可或缺。是故此处西夏文本无误,各汉文本皆脱文。

结合校勘情况可看出,相较于8例西夏文本异文,各汉文本普遍存在脱文问题。这些脱文产生的时间较早,应当在以上所举汉文本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之后在抄本流传的过程中,脱文所引起的新问题不断叠加产生,各版本的内容由此莫衷一是。通过引入西夏文本展开对勘,则能够解决传世汉文本无法厘清的这些问题。以西夏文本中的异文为标尺,可从源头上补传世汉文本之脱,进而修正脱文问题上叠加出现的讹误,并在一定程度上还《论语全解》部分内容以本来面目,西夏文本的不可替代性即在于此。

四、结语

西夏文《论语全解》是现存最早的由非中原政权官方翻译刻印、用非汉字书写的儒学类文献,亦是存世《论语全解》的唯一刻本。通过对西夏文《论语全解》的深入研究和与汉文本的对勘分析,可重新认识西夏文本的译文特色、历史文化价值,凸显其在帮助判定汉文本版本层次、校勘汉文本中的重要性。西夏文本的翻译不仅忠于原文,而且在译文选择和文化适应性上表现出巧妙且恰当的灵活性,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亦为认识宋元时期儒学典籍在各族群中的传播史提供实证;通过对西夏文本与四库本、非四库本系统汉文本的细致对勘,可进一步明确各版本的质量,其中上图明抄本和清乌丝栏本显示出较高的可靠性,而四库本系统汉文本则不宜作为整理底本;在对勘过程中,西夏文本显示出了较高的可靠性,在补充脱文、纠正讹误方面其价值尤为显著。而就文本相近程度而言,明小草斋本与明蓝格本最近,其次是上图明抄本,再次是清乌丝栏本,四库本则与以上这些本子差异较大。此外,通过对勘还识别出一批西夏文异文,这些异文不仅补充了汉文本的缺失,还有助于修正明清汉文抄本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讹误,从而为《论语全解》的文献整理和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证据。未来对西夏文《论语全解》以及其他西夏儒学类文献的进一步研究,应当更紧密地结合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仔细对勘相关汉文本,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些文献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作者简介】郑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宋元文化史、西夏学。